

帝王學

足本全译
文白对照

贞观政要



唐太宗李世民

天津人

前 言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君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最杰出的一位帝王。他辅佐父亲李渊，反隋兴唐，统一天下，亲眼看到了曾一度繁荣兴旺的隋王朝，由于隋炀帝施行暴政而在农民革命风暴中覆灭，感受到人民的巨大力量，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伟大道理。因此“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后，改年号为“贞观”，执政23年，经与诸臣如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王珪、于志宁、杜正伦等反复争议、辩论，言辞尖刻，以致到推搡程度，最后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国安邦的策略：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廉洁奉公，防止腐败，任贤除暴，奖优罚劣，平衡利害，驾驭群僚，消除隐患，防患于未然等。因此出现了商旅野次，马牛布野，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出现了唐以来空前繁荣与安定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政要》就是详细记录这一盛世的重要典籍，由唐吴兢（今河南开封人）编著。该书一反过去纪传体与编年体的繁琐写法，而是以唐太宗治国经验与思想进行分门别类，共十章四十篇。每篇多以故事、轶文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记叙与评介，清晰明了。书中的哲理、教义、格言、名句，俱被反复研讨，广泛引用。因此唐以后的帝王没有不读这本书的。成了“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的教科书。自唐代传入日本后，一直成为日本人心目的宝典，“历代的幕府政权都相继援用，民间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寺庙的僧侣都争相研读”。直到八十年代的日本，还曾掀起了学习《贞观政要》热。南韩总统金泳三在就职前，还专门集中精力研究了《贞观政要》。由此看来，它已成了

各国总统的必读书。

《贞观政要》所涉及的内容有权力、体制、政策、人事、品德、知识、欲望、名份、淫乐、竞争、奖惩、征伐、灾祥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中不仅涉及到唐代的名流，也包括了唐以前正反各方的代表人物，所提到的每一个人物，都富有个性，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取譬机警，妙智横生；举例巧妙，诤问尖刻，立论精辟，尤为令人叹为观止。

不管是在帝制的古代，还是民主的今天，社会、团体、企业，永远都存在着平衡、制约、竞争、权力与非权力的困扰，也都存在着调节好、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的需要，这种调节智慧与经验精义究竟在那里呢？它就在《贞观政要》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出版《帝王学——〈贞观政要〉文白对照》，理由就在这里吧。

我们这次全译工作以明代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本为底本，参校以明成化刊本、四库全书本，吸收了近年诸家的校勘成果，对原书进行了校正。对原文的理解，我们也参考了各注译本，在我们的译文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翻译以直译为主，为了不易出注解而在译文中串讲了典故，也为了使译文的句式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少数地方我们也不拘泥于原文，而采取了意译的方式，个别地方还加括号作了说明。这种尝试是否成功，还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93.6.28.

金泳三的帝王学

金世馨

今年2月25日，金泳三总统从汉城上道洞搬到青瓦台时带的东西并不多，其中有一部描写中国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业绩的《贞观政要》。

金泳三总统读书不多，但他在就任之前集中时间读完了两本书，其中一部就是《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又名《帝王学》，1300年来成了亚洲国家首脑的统治艺术教科书。金泳三总统读了这部历史书以后受益匪浅。

他就任总统后就决心根治“韩国病”，他的改革受到了国民的热烈支持。金泳三总统的说法和做法固然不来自于他40年的政治经验，但受到《贞观政要》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总统秘书室的人说，《贞观政要》的主人公李世民既是理想主义者，又具有清教徒的性格，在这一点上类似金泳三。

李世民善于听取直言，即使是逆耳之言或者反对自己主张的意见也虚心听取。他手下有主张改革的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征等大臣。他们经常向李世民直言陈述各种意见，并得到了信任。金泳三手下的政务长官金德龙和民自党前事务总长崔炯佑也是直言不讳，但金泳三从不计较。

李世民是公私分明的人。有一天，他的堂叔李神通找他邀功请赏。李世民说：“你找我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你只是我的亲戚，我不能公私混淆。”金泳三走马上任后不仅尽量不起用自己的亲

属，即使是过去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如果跟不上改革潮流也不再重用他们。金在淳、朴浚圭被免去职务就是个例子。这一点也类似于《贞观政要》中提出的六正、六邪人事标准。

据说，大唐帝国的文武官员只有 643 人。金泳三也提出了合并和废除某些行政机构的主张。他讲的“小政府”就是来自《贞观政要》的思想。

（原载 1993 年 4 月 28 日韩国《每经周刊》）

上《贞观政要》表

臣兢言：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守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窃惟太宗文武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如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微臣以早居史职，莫不诚诵在心，其有委质策名，立功树德，正词矫义，志在匡君者，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撰成一帙十卷，合四十篇，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望紆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易》不云乎，“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诗》云：“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又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此诚钦奉祖先之义也。惟陛下念之，则万方幸甚！不胜诚愚之至，谨奉表以闻。谨言。

贞观政要序

吴兢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重刻《贞观政要》序

《贞观政要》者，唐史臣吴兢之所辑也。兢，浚仪人，有良史才。用魏元忠，朱敬则荐，诏直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数上疏论事，言人之所难言，寻拜谏议大夫。复修史，转太子左庶子。开元十三年，元宗东封泰山，道中颇驰射为乐，兢复极谏。明年六月，大风，诏群臣陈得失。兢言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八事，皆当时所讳者。景龙间，所修国史失实，兢患之，乃私述《唐史》、《唐春秋》，皆未就。至是，诏赴馆撰录，进封长垣县男。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累迁洪州刺史。复坐累，下除舒州。天宝初，入为恒王傅，卒年八十。兢尝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许之，赖宋璟等邀砺若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屡以情劾改，兢拒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从。世比之为董狐云。其为人大略如此。初，兢屡修国史，见文皇之朝，君明臣忠，可取为后嗣法，乃纂是书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然当复辟之初，转移之机，间不容发，使中宗能观之，以法文皇，则削武氏位号，而崇恩之庙不复矣；信任旧臣敬晖诸人，不罢政事矣；严于阴治，韦氏之祸不致蹈覆辙矣。奈何视为空文而旨之讲？徒使兢之孤忠遑遑焉而无所伸，可胜叹哉！厥后文宗践位，始喜读而笃行之。太和初，政灿然可观，虽未能如贞观之治，亦可谓能法其祖武者矣。自是以来，其书盛行于世。南北刻本，多有舛讹。临川戈直尝集诸家而

校讎之，然亦未能尽善。升有良士曰：“王敬仁，故大族也，欲刊梓于家塾以传。”予遂假中秘本重为正之。理有可通者，因仍其旧，不敢辄改。夫读其书者，不可不知其人，古之道也。复详序兢之行事于首简云。书之篇端，谓兢为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与史所载颇不合。濂疑神龙进书之时，方改右补阙，未应。外迁如此，岂或他有所据耶？奉议大夫国子司业金华宋濂谨序。

高吴郡卢遵良刻

目 录

第一卷

论君道第一	1
论政体第二	12

第二卷

论任贤第三	26
论求谏第四	44
论纳谏第五	53

第三卷

君臣鉴戒第六	87
论择官第七	101
论封建第八	116

第四卷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130
尊敬师傅第十	134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142
规谏太子第十二	151

第五卷

论仁义第十三	169
论忠义第十四	172
论孝友第十五	180
论公平第十六	182
论诚信第十七	192

第六卷

论俭约第十八	199
论谦让第十九	202
论仁惻第二十	205
慎所好第二十一	207
慎言语第二十二	209
杜谗邪第二十三	212
论悔过第二十四	214
论奢纵第二十五	217
论贪鄙第二十六	223

第七卷

崇儒学第二十七	231
论文史第二十八	235
论礼乐第二十九	238

第八卷

论务农第三十	251
论刑法第三十一	254
论赦令第三十二	267
论贡赋第三十三	269
辩兴亡第三十四	274

第九卷

论征伐第三十五	276
论安边第三十六	293

第十卷

论行幸第三十七	302
论畋猎第三十八	304
论灾祥第三十九	308
论慎终第四十	314

贞观政要卷第一

导语 处世要讲艺术。当一个领导人，比如象唐太宗这样的帝王，立身施政用人材，就要有大的驾驭国家的艺术，或者叫大方略与国策。这大方略与国策，就在《贞观政要》里，大抵就是“君道”——当帝王要遵循的道理和规律。

一般人物立身处世都得讲究些方式方法，或者称为处世艺术，那么作一个好的帝王，治好天下，其权谋之术，领导艺术，就更是诡谲异常，深不可测了。从一方面讲，是这样的，从另一方面讲，又不是这样的。

因为，君道是国策与大方略，而不是小心术。小心术是一些小花招，大抵是一些自作聪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数。国策与大方略表现的是人的真诚，在真诚地对待人的基础上，调动自己智慧，也调动别人的力量，求得一个个目标的实现，这是事业成功的根本。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一般人的处事方略，和王者经邦治国的大方略是相同的。但只是一个最高统治者面对的人事，更加强调这一点。

因为，王者的事业是人的事业，所以承认人，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写历史的伟大力量，谦逊地保守自己已得的基业，正是君道的根本。据此大方略的要谛无非：真诚地承认民人，尊敬人民，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伟大道理。

论君道第一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

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理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对待从的大臣说：“做国君的办法，必须首先能使老百姓生存，如果损害百姓利益而只顾奉养自身，就好像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塞肚子，肚子虽然饱了，人却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使自身行为端正。没有身子正而影子弯曲的，上边治理好了下边反而混乱的。我经常想，损伤自身的因素不在自身以外的事物，大都由于各种不良的嗜好和欲望所造成的祸患。假若过度爱好佳肴美味，沉溺于歌舞美女之中，那么所思想得到的越多，所损伤的也就越大。这既有害于国家的治理，又侵扰百姓。况且再说出一些违背事理的话，就会使万民离心涣散，怨恨既然已经产生，叛逆的事也就必然会出现。我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嗜欲去追求享受。”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大多能就近身边诸多事物的体察，所以能够触类旁通远地其它事物。过去楚国聘用詹何，询问他治国的要领。詹何用注重自身品德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效果怎样？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懂得的，实在符合古代的道理。”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蕘。’昔尧、舜之世，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谗言庸违，不能惑也。秦二世

则隐藏其身，指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怎样叫做圣明君主和昏庸君主？”魏徵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上说：‘先辈有这样的话，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古代尧、舜的时候，广开四方之门，招纳天下贤德之士；广开耳目，了解各地情况，听取各种意见。所以圣明的国君没有什么事不知晓，因此共工、鲧这类人，不能堵塞他言路；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胡亥就不是这样，他住在深宫之中，与朝臣相隔离，疏远百姓，偏信赵高的话，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还不知道。梁武帝萧衍偏信蔽主弄权的朱异的话，重用侯景。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梁武帝竟然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唯诺取容的虞世基的话，各路起义军攻取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所以国君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采纳臣下的建议，那权势很重的大臣就不能堵塞下情、蒙蔽君主，而百姓的呼声必能上达国君了。”太宗很称赞魏徵的意见。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

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

〔译文〕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帝王的事业，开创和保持哪一样事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的时候，各路英雄竞相起兵，城被攻破的才肯投降服从他，打败他以后才能制伏他。从这说来，创业艰难。”魏徵接过来讲：“帝王起兵，必须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那些昏乱狂暴的人，百姓就乐于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奉与，故创业不算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志趣趋向骄奢淫逸，老百姓希望安静平安，但各种徭役却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疲敝，而统治者奢侈的事务却一点也不加收敛；国家的衰落破败，常常由这里产生。以此而论，保持已经建立的功业就艰难。”太宗说：“玄龄过去跟随我平定天下，饱尝了艰难困苦，出入于万死之中，侥幸地得到一条生路，所以看到的是创业的艰难。魏徵和我一起治理天下，安抚百姓，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萌芽，这样，必定重蹈危亡的境地，所以看到的是保持已建立的功业的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既然已经过去，保持已建立的功业这一难事，我应当考虑与你们一起谨慎地对待它。”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杰，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我看，自古以来，得到河图而承受天运，承继国家大业，坚持礼乐制度，维护国家法令条文，控制和驾驭各种人才，居帝位

而治理天下的君主，都希望以自己的美德能与天地比配，以自己的高明能与日月齐辉；根基牢固能统治百世，传帝位没有穷尽。然而能坚持始终的人却很少，失败和灭亡的却一个接着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殷人灭夏的亡国的教训不远，可以用来说明。

昔在有隋，统一环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谄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是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译文〕

过去的隋朝，统一天下，军队强大，三十多年间，隋朝的声威远扬万里，震动异国，一旦将它抛弃，全为别人所有。难道隋炀帝他厌恶天下得到治理而百姓安宁，不希望国家长治久安，故意推行夏桀的暴政来造成自己的灭亡吗？他依仗自己的富足强大，不考虑以后的祸患，驱使天下的人来顺从自己的奢欲，耗尽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的美女，寻求远方的奇珍异宝。追求宫殿园林装饰华丽，楼台亭榭建筑峻伟，征发徭役没有期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外表显得威严持重，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进谄献媚的人反而得到加官进爵享尽荣华富贵，忠诚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上下之间互相蒙蔽，君臣之礼义相背离，老百姓忍受不了这种暴政，隋之国土分崩离析。因为这样一个全国尊崇的皇帝，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能不痛心吗？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締構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以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暴，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貽厥孙谋，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译文〕

有非凡才能的人，能把握时机，拯救危亡的国家和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使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生机，松弛的道德规范又重新树立起来，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远方的人前来朝拜，国家达到这样的生平景象没有超过一年；战胜残暴，消除杀戮，也等不了百年。现在，隋朝的宫殿观阁、楼台亭榭，已全部被占用了；奇珍异宝，全部被收交了；宫中美女，全部侍候在君王的身旁了。举国之内，都是君王的臣子与奴婢，如果能借鉴于隋朝失败的教训，常常想想自己是怎样取得天下的，因而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美德而不自恃。烧掉殷纣王所筑鹿台的宝衣，毁掉秦始皇所建阿房宫的宽广宫殿，从那宏伟的宫殿上看到危亡的因素，